

防治蟲媒傳染病「中國方案」惠及全球

學好公民科

近年來，全球蟲媒傳染病疫情 (Vector-borne diseases) 持續升溫，尤其是登革熱等疾病在全球範圍內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2024年全全球登革熱病例創下歷史新高，超過1,440萬例。

這種由蚊媒傳播的疾病不僅威脅各地民眾的生命安全，也對全球公共衛生治理提出了迫切要求。面對這一挑戰，中國以積極的態度與創新的策略投入防控工作，結合國家在多個傳染病防控領域的豐富經驗，不僅在國內築牢了防線，更透過輸出「中國方案」，為全球公共衛生治理貢獻了寶貴的中國智慧，而香港特別行政區也在其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學術與專業支持作用。

在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下稱公民科) 主題3「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的四個課題當中，「公共衛生與人類健康」就是其中一個課題，當中學習重點便包括了「國家和香港對全球公共衛生 (特別是在傳染病防控方面) 的貢獻」，補充說明當中便包含了「傳染病防控：有效防控國內疫情，減緩病毒傳播速度；開展研發疫苗的工作；援助防疫設施不足的

國家/地區對抗疫症」。那麼在公民科的課程框架當中，同學們可以如何理解國家對全球公共衛生特別是傳染病防控的貢獻呢？香港在這個範疇上又作出了什麼貢獻呢？

首先，我國在長期的傳染病防控與全球公共衛生事務中，提供了「中國方案」，從而作出了深遠的貢獻。在過去的重大疫情應對中，中國展現了高效的防控體系，採取果斷措施減緩了病毒的傳播速度，保護了廣大民眾的健康。

同時，我國積極開展疫苗的研發工作，在抗擊新型傳染病的過程中，展現了頂尖的科研實力，並透過技術轉讓和疫苗援助，向防疫設施不足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伸出援手。

此外，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將蟲媒傳染病的防治與公共衛生合作視為核心內容之一。隨著跨境貿易和人員交流增加，中國致力於將本土成熟的防治經驗 (如物理防控、監測預警) 輸出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應對登革熱、瘧疾、寨卡等蟲媒傳染病風險。

與此同時，中國多次派遣醫療專家組，提供醫療物資及基礎建設支援，幫助這些地區提升自身的抗

疫能力，體現了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崇高理念。這些實踐不僅展現了中國在公共衛生領域的擔當，也為全球衛生安全注入了強心針。

港推動創新 與國際接軌

香港作為國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傳染病防控的國際合作與學術研究方面同樣作出了重大貢獻。香港學者在公共衛生、基層醫療及傳染病監測領域的國際經驗，為中國方案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學術支撐。

透過內地與香港學術界及實踐機構的緊密合作，本港不僅協助將中國的經驗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相對接，還推動了這些創新防控策略融入國際技術指南中，凸顯了香港在促進國際公共衛生交流方面的橋樑作用。

至於香港民間力量在協助國家應對全球公共衛生事務中，近年也發揮了積極作用。例如非政府慈善機構共享基金會，早前發布了基於實證研究的《物理手段防控登革熱共識》，推廣了一系列低技術門檻、低成本投入且經實地驗證有效的防控策略。

其中，基金會創新性提出的「防蚊五寶」策略 (包括滅蚊燈、蚊帳、滅蚊紙、快速檢測劑及健康教育海報) 在東帝汶、洪都拉斯以及「一帶一路」沿線項目中取得了顯著成效。在東帝汶周邊國家感染率激增的情況下，當地感染率反而下降了10%，這一成果已兩度獲國際權威醫學期刊《刺針》刊登。

這些防控策略，不僅能有效切斷病毒傳播鏈，更轉化為可複製、可推廣的國際公共產品，展現了「中國方案」在應對全球衛生危機時的實效與智慧。

總括而言，中國在蟲媒病及登革熱防控領域所取得的顯著成就，不僅保障了國民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時通過國際協作，援助防疫設施不足的國家和地區對抗各類疫症。透過不斷總結經驗、分享智慧與提供實質援助，國家與香港在維護全球公共衛生安全的道路上發揮積極作用，為建設一個更安全、更健康的社會作出不懈努力。

●羅展恒
資深文化工作者，從事新聞及教育工作多年，曾主理公民科和通識科相關網站及參與教科書出版。

博物館各出妙招 讓文化「火起來」

中國脈搏

假期出遊，熱門博物館「一票難求」的情況，近年屢見不鮮。很難想像，在十幾年前，中國的博物館還有過「冷冷清清」的階段。

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底全國共有2,970個備案博物館，全年參觀人次約2.8億；而到2024年底，全國備案博物館達到7,046家，全年接待觀眾近15億人次。

飆升的不僅是人氣，還有經濟效益。2025年，全國博物館的文創產品收入，僅用半年時間便超過前一年的總額，達到97億元人民幣。

「鎮館之寶」成美食

除了公仔、鑰匙扣、雪櫃貼等傳統文創產品外，博物館的文創領域進一步擴展到美食、演出、沉浸式體驗、「劇本殺」等新的形式。

不少博物館將「鎮館之寶」做成美食，例如湖北省博物館的編鐘牛肉麵、皿方壘慕斯蛋糕；河南安陽殷墟博物館的甲骨文麵；河北博物院院址的「長信宮燈」板麵等……新奇有趣，大受歡迎。

河南洛陽古墓博物館就因地制宜，推出夜遊探秘，讓遊客「在古墓裏玩劇本殺」。AI (人工智

能)、VR (虛擬實景)、XR (延展實境) 等數碼技術，令博物館的展覽體驗愈來愈多元化。「雲博物館」、數字沉浸展、H5互動遊戲、數字文創等，將博物館搬到電腦和手機上，讓遊客得以「身臨其境」「親眼目睹」敦煌莫高窟、西安秦始皇陵、四川三星堆等文明奇觀。

如今，中國數字博物館用戶已經達到數億人次。博物館是怎樣「熱」起來的呢？首先是經濟發展基礎。統計顯示，近年中國居民恩格爾系數持續下降，2024年降至29.8%，意味着精神文化層面的需求不斷提升。

其次，來自國家層面的政策和資金支持亦非常重要。

2008年，國家文物局等印發《關於全國博物館、紀念館免費開放的通知》，當年全國超過1,000個博物館、紀念館免費開放，觀眾人數較前一年增長160%，這被視為中國博物館事業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2021年5月，文旅部、國家文物局等9部門又發布了推進博物館改革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到2035年要建成世界博物館強國，包括打造10家至15家世界一流博物館；支持省市博物館特色化發展；以及中小博物館推進提升計劃，盤活基層資源。近年來，



●湖北省博物館的編鐘牛肉麵，其中滴蛋經模具壓製，呈現出文物的造型。 視頻截圖

中央財政為博物館、紀念館免費開放提供年均約30億元的補助資金。

有研究報告預測，未來，中國博物館行業市場規模或將增長至2萬億元以上。但從長遠來看，博物館經濟發展依然面臨不少挑戰，包括不同規模博物館存在「冷熱不均」的問題。博物館運營不是以賺最多錢為目的，傳播文化是第一，只有真正讓文物「活起來」，讓文化「火起來」，才能長紅。

Our China Story
當代中國 ●郭立新
簡介：當代中國 (Our China Story) 中英雙語網站，以全新視角介紹今日中國的發展和現況，訪問 ourchina-story.com 瀏覽更多豐富資訊。

公民把脈

秉「科技為器、人文鑄魂」理念 善用AI提升教學效能

近年人工智能 (AI) 席捲全球，教育界正經歷前所未有的範式轉移。相對於理科，強調價值觀、倫理與思辨的人文學科該如何自處？

筆者日前出席業界一個AI創新教案徵集大賽的活動，就匯聚了全港優秀中、小學及準教師的優秀示範。筆者觀摩多份得獎作品後，覺得相關教師的實踐，不單展示了人文教學的突破，更為現今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帶來了極具價值的教學啟示。

公民科的設立，旨在培養學生的慎思明辨能力、國民身份認同以及宏觀的國際視野。然而，面對龐大的資訊與抽象的概念，教師往往面臨如何讓課堂「活起來」的挑戰。

一、化抽象為具體，讓全球化與經濟議題「落地」。

公民科涵蓋不少關於全球經濟、國家發展等宏觀課題。有經濟科教師利用AI輔助開發《Cyber Trade》系統，為學生打造出沉浸式的「經濟學實驗室」，讓學生在模擬的國際貿易中親身體驗市場運作。

對於公民科而言，這種「從遊戲中學習」及數據驅動的模式，能有效將抽象的經濟體系、國家互動等議題具體化。學生不再局限於課本上的文字描述，而是從實踐與數據中探究，真正理解世界格局的運作，培養出堅實的探究精神。

二、科技輔助探究，堅守同理心與道德判斷。

探討社會議題時，價值觀教育的培養是公民科的靈魂。有教師引導學生透過二戰的歷史事件，學習同理心與道德判斷。教師分享時強調，在應用AI時，必須保留人類的道德判斷。這正是公民科亟需強調的「資訊素養」與「AI倫理」。

面對海量且真假難辨的網絡資訊，公民科學生必須學會成為AI的「主動管理者」。他們需要善用科技去梳理客觀數據，但同時必須以同理心和正確價值觀去審視各項社會課題，避免被演算法牽着走，這才是負責任公民應有的素養。

三、活化傳統文化，連結國民身份認同。

認識國家與傳承中華文化是公民科的重要基石。然而，傳統文化有時會讓現代青年感到遙遠。得獎教師以AI工具創作海報、歌曲，成功打破對傳統節日的刻板印象。

公民科教師也可借鑑此法，運用AI工具讓中華文化以互動的形式拉近學生與傳統文化的距離。這不僅能提升學生的數字素養，更能在潛移默化中培養文化自信，自然而然地建立國民身份認同。

歸根究底，公民科的教育目標是培養具備獨立思考、關懷社會的良好公民。科技日新月異，AI無疑是推動創新教學的強大工具，但它終究只是「器」。只要我們秉持「科技為器、人文鑄魂」的理念，善用AI提升教學效能，未來的公民科課堂必定能成為一個充滿智慧、思辨與人文温度的美好場域。

●洪昭隆博士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副校長

古錢「天圓地方」體現「制器尚象」易學特色

易道縱橫

《周易·繫辭傳》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謂古人於中午開放市集，聚合不同貨源，以物易物。惟貨物相易此一交易方式，費時失事，故漸以不同貨幣取代之。其中，又以錢幣為至流行。

錢，《說文·巾部》釋曰：「銚也。古田器。从金，戈聲。」銚即大鋤，乃古代之耕田工具。「錢」為古時常見之物，古人當曾流行以農具作交易工具，故「錢」漸由農具名演變為一種貨物交易媒介之專名。

至於「幣」，《說文·巾部》曰：「幣，帛也。从巾，敝聲。」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帛者，繒也。《聘禮》注曰：『幣，人所造成，以自覆蔽，謂東帛也。愛之斯欲飲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徐灝《說文解字注箋》闡釋曰：「幣，本繒帛之名。因車馬玉帛同為聘享之禮，故渾言之皆備『幣』；引申之，貨泉亦曰『幣』。」

據此可知，「幣」本為繒帛之物，原指禮物，泛指其他一切貨物，又引申指不同交易媒介，統稱貨幣。

「錢」本名「泉」寓流通之意

以錢幣取代貨物，交易相對方便簡單。惟古時之經濟交易，不獨以金錢立幣。《管子·國蓄》曰：

「(先王)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又司馬遷《史記·平準書》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是珠玉、黃金、刀布、龜貝等物，皆為幣。

又有云「泉幣」者，並非以泉水為貨幣，《說文·泉部》曰：「泉，水原也。象水流成川形。凡泉之屬皆从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召旻》曰：『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傳曰：『泉水從中以益者也。』引申之，古者謂錢曰泉布。」是「泉幣」者，蓋借泉水流布不息以形容貨幣之流通也。考《國語·周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韋昭注云：「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貨物，通財用者也。古曰泉，後轉曰錢。」

又《史記·平準書》：「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司馬貞《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均以「泉幣」為先、「錢幣」為後也。

又古代嘗以龜貝為貨幣，《說文·貝部》曰：「貝，海介蟲也。居陸名蜃，在水名蜃。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凡貝之屬皆从貝。」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於「至秦廢貝行錢」句下云：「秦始廢貝專用錢。變泉言錢者，周曰泉，秦曰錢，在周、秦為古今字也。」

按：「泉」、「錢」二字，古音均為從紐部，聲

韻俱同，故可通假。據段注所論，周人用錢，秦人用錢，蓋古今字也；泉、錢古音相同，泉或假借為錢，後人遂以為錢乃正字。然則「泉幣」蓋以泉水流行廣布、源源不竭之意，比喻財貨之流通交易，至秦代始廢「泉」用「錢」，改稱「錢幣」也。

貨幣之流通，有助降低貨物貿易之成本，買賣雙方均可獲利，增長財富，並刺激整體經濟發展。《周易·繫辭傳》曰：「富有之謂大業」、「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明確提出財富之重要。

此外，《繫辭傳》又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指出集市貿易之利；又曰：「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指出水路貿易之利；又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指出陸路貿易之利。凡此皆可見《易傳》對古代經濟活動之重視。

《繫辭傳》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周易》兼重《乾》《坤》，強調剛柔相濟；《易傳》說理，亦屢以《乾》《坤》並舉。觀乎古代錢幣之外形設計，以外圓為天、內方為地，其概念源於古人「天圓地方」之宇宙觀，亦與《周易》乾坤並建、天地相濟之思想密合，體現聖人「制器尚象」之易學特色。

●謝向榮教授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

二戰後中文教育發展 推動港教育多元化

樹仁手記

1941年日軍攻佔香港，香港隨即進入長達三年八個月的日佔時期，其間物資匱乏、通脹嚴重，人口大幅流失。香港的教育體系亦遭受嚴重破壞，由於戰爭與物資短缺，大量學校被迫停辦或縮減規模，校舍遭徵用作軍事或行政用途，師資流失嚴重，學生人數大幅下降。

日佔時期的終結 (1945年) 至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是香港教育歷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的重塑與轉型時期。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香港僅有一所大學——1911年成立的香港大學。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日佔時期結束後，嬰兒潮以及移民浪潮使香港人口

在短時間內急劇膨脹，教育需求隨之大幅上升。

在此背景下，政府部門、宗教團體、民間組織及社會各界積極投身辦學，小學、中學乃至專上教育機構的數量均顯著增加，其中尤以小學擴張最為迅速。街區內新建校舍林立，成為戰後香港重建的重要一環。至於中學與專上教育，則逐步回應以中文中學畢業生為主體的新一代學生需求。

高等教育方面，私立書院的興起與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尤具里程碑意義。1950年代初，由英國商人約翰·凱斯威克 (John Keswick) 主持的高等教育檢討報告首次明確指出，香港迫切需要設立以中文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完整學位體系，以回應中文中學畢業生的升學需求。

此後，新亞、崇基及聯合三所書院相繼發展，並在1963年合組為香港中文大學，開創本地中文高等教育的新局面。

與此同時，中文教育的重要性亦獲得制度性肯定。政府於1954年設立中文中學會考，為中文教育體系與高等教育之間建立起關鍵銜接。1960年代初，《專上學院條例》的制定與聯合文憑考試的引入，進一步為非資助專上院校提供監管與質素保證。

回顧這一時期，香港教育的迅速發展既是對人口變遷的回應，也體現了當時中文教育地位的逐步提升，並且還為香港日後教育普及化與多元化奠定了關鍵基礎，深刻影響了香港社會的長遠走向。

●楊滿羽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